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27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七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怀念陈嘉庚先生	庄希泉(1)
陈嘉庚先生的遗言	庄明理(6)
陈嘉庚与蒋介石决裂经过	庄明理 洪丝丝(10)
陈嘉庚与《南侨日报》	张楚琨(20)
怀念爱国老人陈嘉庚先生	黄周规(35)
回忆中国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	李平衡(42)
大革命时期的司法改革	黄晓东(62)
略谈谢冠生与国民党司法界	金沛仁(68)
CC 渗透的国民党司法界	袁孟涵(75)
国民党法官的训练、使用与司法党化	金沛仁(84)
奇形怪状的旧司法	朱国南(101)
旧中国所谓“司法独立”三例	吴献琛(119)
李光炯先生传	朱光潜(123)
我所知道的郭泰祺	李铁铮(126)

我的宫中生活(下)..... 李玉琴(133)

质疑·补充·订正

对第二十四辑《苏联派第一个代表到漳州》的订正

..... 潘 荣(148)

怀念陈嘉庚先生

庄希泉

我是辛亥年在新加坡认识陈嘉庚先生的。当时，我奉上海革命军政府之命到南洋为革命筹饷，他是新加坡商会董事长、福建华侨筹款组织的负责人。那时的陈嘉庚先生是同盟会会员，剪去辫发，已届不惑之年。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我在上海随父学商。当时的上海是反清革命志士云集之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宣传革命的中心之一。上海的泉漳会馆又是福建革命人士经常聚会之所。会馆办有中学一所，一批思想进步的人士在那里当教员。这所学校需要同乡商号提供资金，我就在这所学校里结识了革命者。在他们的影响下，我阅读了许多革命书刊，如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等，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同情革命，向往革命。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初，为响应武昌首义，上海举行起义，并成立军政府。全国二十五省区中，已有十五个宣布独立，清朝统治土崩瓦解。但是英、美、日、法、德等帝国主义却把革命视为叛乱，指使广州、长沙、汉口、上海等地的外国税务司扣留当地海关税收，企图从经济上扼杀革命。军政府决定组织筹饷队，分赴海外，向广大爱国华侨募集军饷，希望海外华侨能在经济上对中国革命有所帮助。第一批派往新加坡的几个人，在广东、福建两省华侨中分别成立两个赞助会，但所募款数不多。上海都督陈其美决定派军政府财政部长沈缙云再赴南洋筹款，计划筹办一个实业银行，以期对革命有更

多更经常的资助。股金预定为一千万，国内和南洋各募股五百万。我与沈缦云有旧，他约我同往。临动身之时，沈缦云又调任南京政府交通财政部长。我和几个同志随他一起出发了。

我们辗转到了新加坡。当时的新加坡已成为南洋华侨爱国进步运动的中心，革命气氛之高昂使我深受感动。我们很快即招满了股，把几百万元寄回上海。就在这筹饷过程中，我和南洋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经常来往，又因是同乡，过从更密。他慷慨解囊，给我们很大支持。另外，他还寄回几十万元支援国内的反清斗争。当我筹饷到了槟榔屿时，会见了该屿同盟会的负责人黄金庆、陈新政、邱明昶等，都是同乡朋友。他们对我说：“你应该加入同盟会，把这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在陈嘉庚、黄金庆等许多爱国华侨的影响下，经黄金庆、陈新政两人介绍，我在槟榔屿参加了同盟会。我在志愿书上填上庄希泉三个字，还记得我的登记号是四万多。宣誓仪式上，我举拳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实业银行终于开业了，国内总行设于上海，南洋派出吴世荣到上海担任副经理；南洋总分行设在新加坡怒米之律街，我担任该行副经理，那年我才二十四岁。实业银行南洋总行的工作初步就绪之后，我即回国述职，时正值袁世凯破坏革命，拒绝到南京出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采取退让政策，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并派宋教仁北上当总理，宋还未上任却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袁世凯下令以武力镇压革命，上海陷于一片恐怖之中。沈缦云被通缉，逃往大连。我赶至大连，找到沈缦云，商议实业银行的出路问题。鉴于袁世凯勾结帝国主义，反动气焰甚嚣尘上，银行不得不解散。待至将股金一一发还各股东之后，我重又回到新加坡，另寻救国之道。

一九二〇年，我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女学，又开办一家国货公司。那时与陈嘉庚先生来往更密，我向他学习办学、办企业的经验。记得有这样一件事：

李光前先生原在我公司工作，后来想转到陈嘉庚先生经营的

商号去，而李光前与我公司订有合同在先，按规定，合同期未滿离职是要罚款的。当时我想，李光前先生到陈嘉庚那里工作，也许对发挥他的才能更为有利，于是我支持他，并放弃一切要求。后来，李光前果然得以人尽其才，并成为陈嘉庚先生之快婿，是今天南洋最大的实业家之一。这本来是无足挂齿的小事，然而陈嘉庚、李光前竟多次对我表示谢忱。光前先生每次回国，还常来探望。

陈嘉庚先生倾家兴学，誉满海内外。他亲手创办的集美学校与厦门大学，至今已有六十多年历史，培养了无数人才，尤其是集美航海学校所培养的航海专业人才，足迹遍及四大洲五大洋。在他的影响带动下，解放后李光前也出资数千万元，扩建了厦门大学。规模宏大，环境幽美，是厦门海滨一颗璀灿的明珠。陈嘉庚先生不仅在国内办学，他还为海外华侨子弟先后创办了五所华文中小学、两所中专；赞助兴办一所大学；资助过八所华侨学校。陈嘉庚先生办学目的是爱国、救国，因此，他表现出百折不回的顽强毅力。就集美、厦大而言，虽几经挫折，但他仍倾全力加以维持。这绝非沽名钓誉或浅尝辄止者所能为。陈嘉庚先生亲自手订的校训“诚毅”二字，正是他办学精神的极好概括。

我也曾经探索过“教育救国”的道路，崎岖、坎坷，使我备尝艰苦。

一九二〇年，我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女学，适逢国内五四运动爆发不久，英国殖民当局深恐革命浪潮波及南洋，突然抛出一个所谓“学校教育条例”，规定创办学校必须注册，校长教员必须经当局审查方可任职；教材必须批准方能使用；甚至国内来的学生也需当局审查方准入学。这是英国殖民当局限制并扼杀华侨教育事业的苛刻条例，当即遭到华侨教育界以及商界、工界人士的强烈反对。我们联名请愿，要求取消这一苛例，签名者竟达数万人。我们推举檳榔嶼银行经理为代表到英国向政府请愿；选派余佩皋女士回国，向政府提出要求国际交涉。但英国殖民当局竟采取卑劣手段，纠集几所学校的御用董事，强行表决通过，并将我以及陈寿民等三个请愿

代表拘留入狱。最后判我“永远驱逐出境”。我回到家乡厦门，满以为可以摆脱殖民政府的控制，为振兴民族教育贡献一分力量。在爱国侨胞的资助下，我和余佩皋女士重又创办了厦南女中。但到一九二五年因师生抗日爱国热情高涨，遭日本帝国主义的嫉恨，又把我捕入狱，余佩皋女士被迫星夜逃走。由己及彼，当年陈嘉庚先生兴学，其难可知。

陈嘉庚先生的爱国是从实际出发的。抗战初期，蒋介石假爱国之名，欺骗华侨捐献巨款回国，陈嘉庚先生亦曾捐款几十万。一九四〇年，陈嘉庚先生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到全国各地慰劳视察。当他了解到华侨的血汗，没有用于抗战，而是饱了蒋介石集团的私囊，极为愤慨。他到了重庆，看到国民党官员贪污腐败，对抗战前途益感忧虑，故决定去延安，却受到蒋介石集团的种种阻挠。他排除一切障碍，终于到达延安，会见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目睹延安军民奋起抗日，卓有成效，他开始确信救中国者非中国共产党莫属。对抗战前途，表示乐观，并到处宣传延安精神。从此，他坚决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边，与蒋介石卖国行为进行坚决斗争。当日寇逼近南洋之时，许多人劝他暂避锋芒，但他却坚持留在南洋，组织侨众抵抗日寇，直至新加坡沦陷前夕，他才匆匆避往印尼。

全国解放前夕，正当酝酿成立人民政权之时，我在香港。一天，饶彰风找我，谈及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已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华侨界需要推举一位侨领，以领导华侨工作。而这一侨领唯陈嘉庚最适宜。他拟让我赴新加坡，邀请陈嘉庚先生回国参政。我奉命到新加坡拜会了陈先生，说明情况，并转达这一真诚的邀请。陈嘉庚先生当即表示接受邀请，但又顾虑新加坡殖民当局会因此加害于他的亲属及在南洋的产业。我对他说，不要紧的，你尽管回去。你可以声明，不是你要回去，而是国内发表了对你的任命，盛情难却。这样，当地政府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以及与新中国的关系，不致于采取不明智的态度。

陈嘉庚当即高兴地表示同意，并邀我同行回国。我说，请你先走，我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我们会在祖国再见的。不久，陈嘉庚先生即收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来的邀电。

一九四九年九月，陈嘉庚先生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宣布委任他为中侨委主任，我为副主任。从此，我们在新中国的侨务战线上再次共同战斗，直至他一九六一年因病逝世。

陈嘉庚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他在南洋胼手胝足几十年，那里有他艰苦创业留下的巨额资财，有他一百多个嫡亲子孙。全国解放后，他毅然放弃优裕的物质生活，不要一个子孙陪同，回国定居，为新中国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他不愧是中华民族杰出的儿子，爱国华侨的楷模。党和人民对他一生的功绩，给予极高的评价，他的名字将与那些曾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不朽贡献的先驱者们一起永垂青史！

陈嘉庚先生的遗言

庄明理

陈嘉庚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了。二十年来，每接触到与陈老有关的事物，莫不令人回忆起嘉庚先生的许多往事。

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著名爱国人士致以深切怀念，陈嘉庚先生也是其中之一。陈嘉庚先生对党和国家、对社会有着不朽的贡献，他的光辉业绩给予海外侨胞和广大归侨、侨眷以莫大的鼓舞，成为全体爱国华侨的一面旗帜。

一九五八年初，我因事回福建，并去厦门看望嘉庚先生。适先生正准备到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三次会议及一届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顺便陪先生一道北上。在火车上看他有点疲倦，问他是否身体欠适？先生答：“最近有时感到头痛，睡眠不太好。”我请他早点休息。翌晨过其卧室，发现老先生右额眉上有一点隆起，似是碰伤，问先生是否夜里起来摸黑碰伤？他说：睡不好，起来两次，似未碰着。他一面答一面用手摸自己额头，觉得右额眉上确有一个肿块，就说：“或者是夜里车开得快，摇晃，不注意碰了一下，不要紧。”到京后头几天，头痛未见轻，隆肿的瘤子更加明显了。请他到医院诊治，嘉庚先生不愿意。他自己看新编药册验方，抄了头痛、头风一剂验方，交随来的服务员到中药店买。方中有一味“川乌头”，写明“半生熟”，药店的配药员不理解药的用法，而以一半用制川乌头，一半用生川乌头，与其他药物共研为末。当天晚上服了一剂，晨起空腹又服一剂，不久，觉得头晕，即和衣躺在床上。

上。服务员见时间不早了，为何老先生还不下来早膳？乃上楼去请，发觉情况不对，即刻打电话告诉我，我立即电话通知保健局及北京医院，请医生急往马匹厂陈老住处，我们也及时赶到。上楼一看，发现柜台上撒了一些药粉。一面请医生急诊，一面查看了药方，发觉方里有“川乌头”半生半熟，如用生的，就有毒。乃急送医院，经全面检查、诊断，额上眉头那个肿块是个瘤子，活检证明是“鳞状上皮瘤”。于是进行了手术及放射治疗。经过治疗，病况得以控制。医生及陈老本人及其从新加坡赶来看望的七子陈元济夫妇都感到满意，老人家高高兴兴回集美。不料过了半年多，他视觉发现双影。随请吴恒兴院长和上海郭秉宽眼科专家一道去集美会诊，发现右眼眶内上壁有肿块，乃请陈老到上海华东医院治疗，并延请几位专家一起会诊。专家们提出两个治疗方案：一为进行手术，可能要伤及眼睛；一为放射治疗。嘉庚先生不接受手术。先生的二子陈厥祥夫妇从香港赶来，对医院组织专家们为其父会诊，很是感动，对治疗方案，也表示尊重他父亲的意见，最好不要手术。几位专家认为陈老身体虽很健康，但因年事已高，同意采取放射治疗，使肿瘤得以控制。一九六一年三月间，开始发现脑血管发生故障，病情日趋严重。这段期间，卫生部保健局加强了对嘉庚先生的护理工作，派保健医生和护士住在嘉庚先生的寓所。在京的亲友也经常到其前圆恩寺寓所探望。就在脑溢血的前夜，嘉庚先生还和我谈了一些往事，也谈了他身后的若干问题。因为时间不早了，我劝他休息，就告辞回家。刚进家门，家里就告诉我，和成同志（嘉庚先生的警卫员）来电话说，老先生请你再去，还有话跟你说。我踌躇了一下再去，进屋看老先生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似已入睡。我站了一会儿，还是想让他休息，不拟吵醒他，刚移步，忽闻他叫我的名。我转过身看他，问：“嘉庚叔（习惯尊称他）有什么事吗？”他说，“嗯，你请坐，有几件事，想跟你说。一、是自己身后的事，死后不要火化，希望运回集美安葬。二、人总要死，死不要紧，最要紧是国家前途。中国有两派，旧的一派是国民党，这一派很坏，新的是共产党，她领导全国人民，

建设社会主义。人都有一死，早死晚死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国家。国民党过去做尽坏事，他们逃到台湾去了，那些人一生自私自利，假公行私，现在还在捣乱。我们应尽早解决台湾和内地的和平统一。三、集美学校一定要继续办下去。香港集友银行是集美学校的校产，每年都有股息和红利。厦门、上海两所集友银行，也是校产，它们赚钱不多，只要不亏本就可以。学校要继续办下去。”嘉庚先生讲到这里，看来有点疲倦，我怕他太累，请他休息。当时随侍在旁的有嘉庚先生的第八儿子国怀和孙儿联辉及叶祖彬、林和成等。

第二天早晨，我电话问陈老的情况，据护士答，体温、血压都正常。我即向方方汇报嘉庚先生昨晚的讲话及他的身体情况。我对老人家讲话断断续续、疲倦的样子，颇为担忧。上午十点多钟，陈老寓所来电话说老先生病情突变，人已昏迷，手足抽搐，通知我们赶快去。廖承志主任、方方副主任和我立即赶去。中侨委许多同志也相继赶到。肿瘤医院吴恒兴院长、北京医院计院长和协和医院张副院长及有关的专家和医护人员立即会诊，诊断为脑溢血。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抢救，手足抽搐逐渐缓和。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彭真副委员长得知嘉庚先生病况突变，也先后赶来探视，并指示在场医护人员采取一切措施抢救及细心护理。并慰问远程归来随侍在侧的陈国怀先生父子。

周总理还关切地询问：嘉老病变前有什么交代吗？我们即将昨晚嘉庚先生交代的三件事向总理汇报。总理指示：第一，应按嘉老的意愿办理。第二，解放台湾是全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爱国侨胞的共同愿望。嘉老关心台湾回归祖国，他的爱国精神给广大华侨树立良好榜样。他的愿望一定会实现。嘉老如醒过来，请告诉他，台湾回归祖国一定要实现，请他放心。第三，集美学校一定照嘉老的意见继续办下去，一定要把它办得更好，请他放心。嘉庚先生弥留的日子，有一段情况比较稳定。他虽不能言语，但有时能朝着护理人员话音的方向望望，似有了知觉。这时，我们把周总理的嘱咐告诉了陈老，他听着，慈祥的颜容现出宽慰的表情。每当回忆起这件

事，周总理和嘉庚先生的音容笑貌，仿佛又在眼前。

嘉庚先生在处理他的私人财产的遗嘱中，他没有把财产留给子孙后代，而全部作为集美学校的校产。先生对子孙回来安家作了如下规定，每人每月发给二十五元的生活费。孙儿读书，每月另补贴学杂费，直至毕业或自己不再学习时为止。但如留在集美学校工作，支领学校工资，则应扣抵。

嘉庚先生热心于教育事业，早在民国初年，就认为“教育不振，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言念及此，良可悲已。……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撓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殫心力而为之，唯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摘自一九一八年致集美学校诸生书）

在《论兴学与爱子》一文中曾云：“父之爱子实出天性，人谁不爱其子，唯别有道德之爱，非多遗金钱方谓之爱。且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是乃害之，而非爱也。”

嘉庚先生立此志念，几十年如一日。当先生事业兴盛的时候，两校（集美、厦大）经常费三年支付二百七十余万元，再加其他公益义捐共为四百余万元。当事业遭受不景气的冲击时，有人劝陈先生暂停支付两校经费。先生说：“余不任放弃义务，毅力支持。盖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罪大，在商业尚可经营之际，何可遽行停止。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可见嘉庚先生对国家、社会之责任心有多么强。

嘉庚先生虽然已离世二十年了，但他热爱祖国、热心教育事业的精神，将永远为人们传颂。

陈嘉庚与蒋介石决裂经过

庄明理 洪丝丝

陈嘉庚对蒋介石的认识有个过程。他是由拥蒋转变到坚决反蒋的。

一九二八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陈嘉庚认为它是中国正统的中央政府，特地给他所创办的新加坡《南洋商报》订了一条守则，就是要拥护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虽然和陈嘉庚很早就有往来，在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的时候，汪曾答应担任厦门大学的校长，但是在蒋汪争权夺利的斗争中，陈嘉庚始终拥护蒋介石所把持的南京政府。

一九三六年，南京政府为了庆祝蒋介石五十诞辰，请陈嘉庚发动华侨捐款购买飞机祝寿。最初只希望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华侨捐十万元购买飞机一架，但是陈嘉庚领导马来亚华侨的“购机寿蒋会”，竟捐得国币一百三十多万元，可购机十多架（当时新加坡币六十多元等于国币一百元）。虽然当时陈嘉庚的动机是爱国，目的是要加强中国空军的力量，以抵抗日本的侵略，但亦可看出他当时是拥蒋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以后，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号召下，奋起抗日。这时，陈嘉庚领导南洋华侨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募捐巨款，支持祖国抗战，仅一九三八和一九三九两年，就达国币一亿四千四百四十五万六千元，加上一九三七和一九四〇两年的捐款，总数约达二三亿元。除此以外，陈嘉庚

还在南洋主持劝募购买“救国公债”的工作，一九三八年，仅在马来亚就募购公债一千五百万元；又为宋美龄任主席的重庆“难童保育会”和“寒衣募捐会”在马来亚向华侨募捐五百多万元。

当时中国半壁河山已沦于敌人的铁蹄之下，财政来源大大减少，华侨捐款加上华侨贍家汇款对祖国的财政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据一九四〇年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一九三九年军费为十八亿元。同年华侨汇回祖国之款达十一亿元，其中捐款约占百分之十，而南洋华侨捐款占华侨捐款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多。陈嘉庚曾经指出，按世界银行发行纸币的通例，一元基金可发纸币四元，当年华侨所汇十一亿元的外汇，可发纸币四十四亿元，除交还侨眷贍家费十亿元外，还有三十四亿元可充军政费用。陈嘉庚为了抗战救国，领导华侨筹赈，始终是十分努力的。

一九四〇年三月，南侨总会组织的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简称慰劳团）回国慰劳抗战军民和视察，陈嘉庚也在当月下旬，以南侨总会主席身份回国考察和慰问。蒋介石政府因为陈嘉庚对华侨界有巨大号召力，特别是因为陈嘉庚领导华侨筹赈作出了很大成绩，把他当作一个大财神，因而把欢迎陈嘉庚当作一件大事，动员了有关的党、政、军大员欢迎并接待陈嘉庚。

陈嘉庚虽然常自称是政治的门外汉，可是一九三八年秋，却是他首先揭穿汪精卫妄谈“和平”的阴谋，并且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一个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这个提案得到全国爱国人士的热烈赞扬，连国民党的投降派也不敢公然反对。它不但及时揭露了汪精卫一伙汉奸卖国的嘴脸，也使蒋介石在对日求和方面不能不有所顾忌。因此，当时笼罩重庆的企图对敌妥协的气氛顿时消失一大半，大大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邹韬奋在《抗战以来》一书中对陈嘉庚这个提案，满腔热情地推崇说：“这寥寥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由于这些原因，陈嘉庚回国慰劳考察也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方面爱国人士的欢迎和重视。

国民党当局在蒋介石亲自策划之下，对待陈嘉庚的主要手法，最初是“捧”和“拉”，就是挖空心思地捧，千方百计地拉。

为了捧陈，蒋政府在重庆一地即准备八万元经费，要举行一系列大小宴会，以博取陈嘉庚的欢心。不料陈对这样的奢侈应酬极为反感，他认为在军民艰苦抗战之时，不该如此铺张浪费，并担心引起各地连锁反应，竞相挥霍，因此特地在重庆各报刊登一则启事：“闻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劳团，余实深感谢。然慰劳团一切用费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希望政府及社会原谅！”

慰劳团中的国民党人侯西反，说他在重庆六十多天，无日不被请赴宴，常常一天要赴宴两次。陈嘉庚对国民党官僚这种作风印象很坏。

蒋介石他们认为，如果能把陈嘉庚拉入国民党，不但可以借助于这个大财神，使他们“生财有道”；还可以利用他的威望，为国民党欺骗和引诱广大华侨。因此，在陈嘉庚到达重庆不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就在一个宴会上宣布：“我们欢迎陈嘉庚先生来共同领导国民党！”陈嘉庚沉默不语，一时宴会上静寂无声，使朱家骅十分尴尬。老奸巨猾的戴季陶看见陈嘉庚面有不愉之色，赶快起来打圆场说：“陈先生热诚为国家社会服务，入党不入党是一样的。”这才缓和了宴会上的紧张空气。他们原以为当场给陈老一顶高帽子，不难把他拉入党内，哪里知道陈嘉庚不上他们的圈套。

蒋介石在第一次宴请陈嘉庚时，装出一副虚怀若谷的假相，问陈对重庆有何观感。陈嘉庚说，他自己对政治是个门外汉，重庆工厂又还未参观，提不出什么重要的意见，只觉得重庆的人力车和汽车都很脏，不但影响观瞻，也不卫生。蒋介石一听，煞有介事似地把意见记入手册，并下令全市车辆要注意清洁卫生。这只不过是做给陈看，以讨陈的欢心而已。

蒋介石又听说陈嘉庚平素俭朴，所以在嘉陵新村特地只用四

五样菜加些面包招待陈嘉庚和慰劳团，以标榜其所谓的新生活运动。但重庆达官贵人们花天酒地、挥金若土的情形，瞒不过陈嘉庚的眼睛。在重庆，最令陈嘉庚不满的是蒋介石政府要员的贪污营私。嘉陵新村富丽堂皇的大官私邸，使他极为惊讶；当他听到那座宏伟新颖的嘉陵宾馆为孔祥熙私人所开时，起初不大相信，后来孔恬不知耻地承认确是他所开办，使陈嘉庚为之愕然。他想孔祥熙长期担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竟公然私营企业，搜刮民脂，可见国民党大官贪污腐化确非虚传。

一次重庆经济学社请陈嘉庚在重庆大学礼堂演讲有关华侨回国投资问题。陈老指出，要华侨回国投资，国民党政府必须先有信用。大会主席马寅初最后讲话，称赞陈老的话切中时弊，并且说：“现在国家不幸遭受强敌侵略，危险万状。可是保管外汇的人，却不顾大局，偷窃外汇，而且贪得无厌，获利竟达六七千万元，将留给自己子孙买棺材！”马寅初慷慨激昂，几乎声泪俱下，使陈老深深感动。他说：“其忠勇直爽，不怕权威，深为在座千百人所敬仰。”坐在陈老旁边的川康平民银行周季海悄悄对陈老说：“这种话，除了马寅初，谁也不敢说。”陈老因此十分敬佩马寅初，同时对蒋介石政府的贪污腐化有了更深的印象。

陈嘉庚虽然对重庆许多现象感到很失望，但是中国什么地方有光明，他当时还看不出来，所以还寄希望于蒋介石能够改革弊政，使抗战获得最后的胜利。他在重庆出席许多大会，如国民参政会的欢迎会（陈老也是参政员）、重庆军政民各界联合欢迎会、政府各机关欢迎慰劳团的宴会等等，也和许多重要人物谈过话，包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孔祥熙、立法院长孙科、监察院长于右任、司法院长居正、考试院长戴季陶，以及宋子文、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冯玉祥、邵力子、翁文灏、王世杰等等。他在这期间的发言，主要是报告华侨支持抗战的情况，询问我国抗战中的军事和经济等问题，尤其关心国共两党能否合作抗战到底，对于蒋介石政府的贪污腐化还不曾公开提出抨击，只闷在心里。当时在重庆的中共负责